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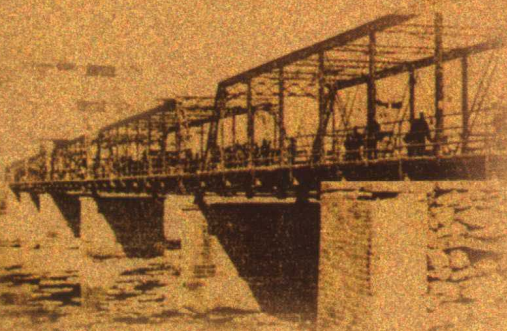
西北通史

第四卷

丛书主编 谷苞
本卷主编 尹伟先 副主编 马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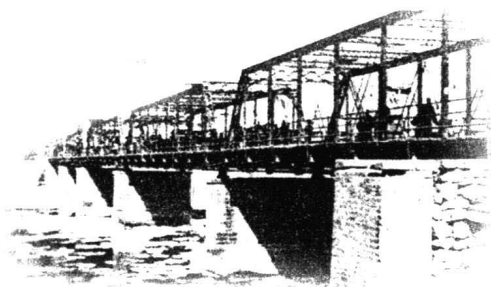


兰州大学出版社



西北通史

第四卷



丛书主编 谷 苞
本卷主编 尹伟先
副主编 马啸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北通史. 第4卷/谷苞主编;尹伟先分册主编.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6
ISBN 7-311-02226-6

I. 西... II. ①谷...②尹... III. 西北地区—地方史 IV. K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7576 号

西北通史(第四卷)

丛书主编 谷苞

本卷主编 尹伟先

副主编 马啸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电话:8912613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25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670 千字

印数:1~2000 册

ISBN7-311-02226-6/K·290

定价:精装 358.00 元
平装 258.00 元
(共 5 卷)

序

谷 芭

西汉政府未设置河西四郡之前，汉代的版图内存在着各有一大片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游牧区和农业区。那时候，长城和天山以北，是匈奴、东胡、丁零、坚昆、乌孙等民族的游牧区；在青藏高原的青海部分及其毗邻地区——今为甘肃、四川、云南的一些地方，则是西羌、氏、冉骊、苻都、白马等民族的游牧区。上述的游牧区原来是连成一片的。西汉政府为了“隔绝羌胡”，设置了河西四郡，将河西地区由游牧区变成了农业区，把蒙古草原同青藏高原及其毗邻的游牧区隔离开了，使原来连成一片的游牧区，分隔为两片游牧区。

地跨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则是一大片农业区，生息在这片农业区的民族，有汉、南蛮、东夷、百越、西南夷等。农业区的诸民族，其人口远较游牧区诸民族为多，其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也较游牧区为高。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广大的农业区和游牧区一直是同时并存的。农业区诸民族与游牧区诸民族的民族关系问题，一直是我国最重要、最持久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为世界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游牧民族是不能生产其生活和生产上所需要的全部物资的。游牧民族为了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只有两条途径：一为掠夺；二为交易。在古代世界史上，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掠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掠夺财物，也掠夺人口，特别是掠夺妇女与儿童。但是掠夺必然要遭到被掠夺者的拼命反抗，甚至事后还要遭到被掠

夺者的军事报复。就我国的情况而论,游牧民族所发动的掠夺,要夺取农业区戒备森严的城池堡塞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这种掠夺往往是得不偿失的。譬如,《新唐书·回鹘传》中就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建中元年(780年),唐代宗去世,回鹘牟羽可汗受人挑唆,意欲乘丧大举劫掠,以为“可获大利”。顿莫贺劝阻说:“唐大国也,无负于我。吾前年侵太原,获羊马数万,可谓大捷。而道远粮乏,比归,士卒多徒行者。今举国深入,万一不捷,将安归乎?”这段话总结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出自一个回鹘贵族之口,尤为可贵。在我国历史上游牧贵族发动的对农业民族的掠夺与报复,不仅对农业区的居民造成了苦难,也给广大牧民造成了灾难。

游牧贵族发动的对农业区的掠夺,一般说来,在一年当中只有一次,都是在入秋以后到严冬来临之前进行的。虽然每年仅有一次,但对于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所造成的恶果,却是非常巨大的。它是造成民族纠纷、民族隔阂和民族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游牧区与农业区的贸易,互补性很强,对各族牧民和各族农民都是有利的,而且是年年、月月、天天都可以进行的,即使在民族间存在着不和睦的状态下,也还是照常进行的。游牧区的活畜(驴、骡、马、牛、羊)、畜产品(皮、毛等)、猎产品以及其药材等进入农业区,对改善农业区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起着很大的作用。同时农业区的粮食、纺织品(原先为丝、麻织品,后来又有了棉织品)、金属工具和生活用具、茶叶以及多种生活用品进入游牧区,对改善各族牧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也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游牧区与农业区互通有无的贸易,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不可缺少的。这种关系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关系。

元、明、清以后,特别是在清朝,长城、天山以北及青藏高原和邻近地区,在原来大片游牧区内发展了成片的日渐扩大的农业区。现今我国西北地区的新疆、青海、甘肃仍然有大片的游牧区。这三省区的游牧区,是我国五大游牧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两大游牧区,为内

蒙古和西藏自治区中的游牧区。

在西北五省区中,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游牧区与农业区同时并存的格局,这中间虽然存在着农业区扩大和游牧区缩小的变化,但是农业区与游牧区同时并存的格局仍然未变。直到现在,西北五省区内的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裕固族以及图瓦人等,仍然是以畜牧业生产为主要生产部门,在昆仑山南麓一小部分维吾尔族,也是从事畜牧业生产的。

在我国西北地区从事农业的民族,有汉、回、维吾尔、锡伯、达斡尔、撒拉、保安、东乡、土等民族。灌溉农业(包括新疆天山以南和甘肃河西地区绿洲农业)和旱作农业(包括黄土高原干旱地区与青藏高原高寒地区),是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显著特点。

在西北地区,农业区与游牧区并存的格局,是和西北地区的自然地理的特点密切联系着的。各族牧民把干旱的荒漠、半荒漠以及河谷、山麓、高山、高原地带,巧妙地安排为四季轮牧的牧场,这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发明创造,其功甚伟。西北地区的绿洲农业以及黄土高原和其他山区的旱作农业,也是各族农民对农业生产的伟大贡献。西北地区农、牧业生产的产品是丰富而多样的。

需要深入研究西北地区文化及其特点,需要深入揭示西北地区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巨大贡献。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给予当代西北地区史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依我想,西北地区的文化有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第一,西北地区的文化是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源头。解放前,在北平市宣武门外的关中会馆门口,有一副对联,共8个大字:“羲皇故里;河岳根源。”关中会馆是陕甘两省共有的会馆。写这副对联时的甘肃,是包括甘、青、宁三省在内的。这副对联的上联,说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下联则说的是孕育中华民族的黄河、长江均发源青海,而屹立在中华民族心头的山岳,均发源于新疆西南的帕米尔高原。人们都知道:羲皇庙位于甘肃省天水市;轩辕黄帝陵(黄

陵)位于陕西省黄陵县;炎帝陵位于宝鸡市。伏羲、黄帝、炎帝原来也都是石器时代(原始社会)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后来演变成了历史人物。他们的历史功绩不是一般的功绩,被认为是“人文初祖”,是“三皇五帝”传说中的代表人物,从现代历史学的观点看来,他们都具有缔造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伟大功绩。这样的历史功绩,只能是中华民族在孕育时期通过旧石器时代以来二三百万年的众多先民的发明创造而形成的,不可能仅仅是少数几个人所创造的。人们把千万代的先民从开始使用火和石器、弓箭、陶器的洪荒时代,直到使用金属工具、发明文字、创造多种典章制度的文明时代这一历史功绩,集中在伏羲、黄帝、炎帝等少数人的身上,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但是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华夏族(后来的汉族)和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如匈奴、羌、氏、吴、楚、越(包括两越)、瑶等民族,都把黄帝、炎帝看作是自己的祖先,都认为承袭了黄帝、炎帝所流传下来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个历史遗产对中华民族在精神上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是中国大统一思想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在历史上,我国的少数民族曾经在边疆地区和内地汉族聚居区建立过许多地区性政权。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南宋与辽、金、西夏对峙时期,都是这样。蒙古族和满族还曾建立过全国政权——元朝和清朝。少数民族建立的地区性的政权,大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元朝和清朝也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论朝代如何变换,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却从来没有中断过。这种历史现象,为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见,是值得我国各族人民引以为荣的。

第二,西北地区一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这块共同生活的土地上,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存在密切的联系。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汉族是多元一体的,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也是多元一体的。各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并通过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西北地区文化的内涵,有三个重要的体系:一是

以蒙、藏、哈族为代表的游牧文化(包括先前的匈奴、突厥、回鹘等民族文化);二是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绿洲农业文化(包括河西走廊地区);三是以汉族为代表的黄土高原中西部旱作农业文化(包括西夏和回、东乡、保安、土族等文化)。这里只是先把问题提出来,请诸同志考虑,是否有点道理。至于对这个问题详细的论述,容我以后另文再作申述。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把游牧文化看作是一种落后文化。这个看法是难以成立的。我曾在《论正确阐明古代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有过论述。^① 农业与游牧业相比,只是生产部门的差异,并无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农业与游牧业都是把土地作为最主要的生产基础的,只是使用土地的方式不同罢了。牧民是把土地当做牧场使用的,在牧场上饲养和繁殖马、牛、羊、驼、驴、骡,生产肉、乳、皮、毛,用以满足人们吃、穿、用、住(可移动的毡房、帐篷是用羊毛毡和牛毛褥子制作的)。农民是把土地当做耕地使用的,通过播种收获粮食、油料、纤维作物(麻、棉)以及果、蔬等,用以满足吃、穿、用的需要。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如桓宽《盐铁论》及顾炎武《日知录·驴骡》一文中指出的,在汉朝及后来游牧区的马、驴、骡等输入内地农业区,对促进内地农业、手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还应该指出,游牧区大量马匹进入内地,对于中原王朝建立骑兵做出过巨大贡献。赵武灵王学习胡服骑射,说明骑兵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军事史上,骑兵淘汰了战车,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在中国历史上,除个别例外,一般都是由北方的政治势力统一全国的。这中间固然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北方的骑兵是有较强的战斗力的。在南北朝时期,南朝各代是比较弱的;在宋与辽、金、夏对峙时期,宋是比较弱的。除其他原因外,南朝与宋缺乏建立骑兵的马源,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西南的云、贵等地虽也产

① 见拙著《民族研究文选》。

马,但体形较小,是难以与高大的北方马相匹敌的。我国伊犁地区的西极马、甘肃玛曲地方的河曲马以及蒙古马等,是久负盛名的良种马。

天山以南,由塞人、焉耆龟兹人所建立的绿洲农业文化,对丰富中华民族文化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天山以南的各个绿洲,是我国种植棉花最早的地区。南疆民丰县曾发现过东汉时期的棉布,在南北朝时期各个绿洲都已经普遍种植棉花了。内地种植棉花的时间晚得多,直到元、明时期才大量种植。唐朝宫廷十部乐中的《疏勒乐》、《龟兹乐》、《高昌乐》,都是由新疆在南北朝时期及以后传入的。十部乐中的《西凉乐》,是龟兹乐传到凉州后与汉族和当地少数民族音乐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乐种。《龟兹乐》和《西凉乐》在内地民间最为流行,唐朝诗人王建在《凉州行》一诗中曾写道:“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古代新疆的乐曲、乐器、舞蹈,还对我国宋词、元曲和戏剧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宋词中有许多词牌的名称,还沿用着古代新疆乐曲的名称。

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对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保卫西北,曾经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因此,西北地区史中,需要充分体现少数民族对缔造祖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功绩。多年来有些学者一再提出历史著作中经济、文化的内容比较薄弱,需要加强。我完全赞同这种看法。但是,必须看到,要真的做到这一点,还是很不容易的,必须下大力气,进行发掘工作。需要重视民族文字的史料,也需要重视考古和社会调查的材料。当然,应该看到这方面的一些有利条件,由于《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和国内有关专著的编辑出版,西北各省区民族文字古籍的整理及翻译出版,以及西北各省区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一些科研专著的问世,也都为编写西北地区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这方面的丰富史料,有待于我们继续发掘,并作出正确的评价。应该重视对于少数民族出身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对全国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应根据其对全国的影响加以评价,不能仅根据其在某一地区

的某一事件作出评价。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有利于巩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也是正确地阐明西北地区史所不可缺少的。

第三,西北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主道所经过的地区,对于促进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对于促进东方各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曾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关于古代的丝绸之路,曾经有过多种说法,认为有多种道路。像人们所曾经指出的,有所谓的“森林道”、“草原道”以及通过西南地区的南方丝绸之路等。但是无论如何,由长安或洛阳出发,经过甘肃、新疆通往西域各国的道路,却始终是丝绸之路的主道。这是有许多文献资料与文物古迹可以作证的。这里只谈一点,由新疆轮台县的克孜尔、库车县的洪木吐拉、吐鲁番县的木头沟、鄯善县的吐峪沟,到甘肃境内敦煌县的莫高窟、永靖县的炳灵寺、天水市的麦积山,直到河南省洛阳市南面的龙门石窟,有为数众多的东西文化交流和荟萃的地方,以丝绸为主,兼及药材等,曾经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到这些地方来进行贸易。伴随着商业活动,西方各国的文化和宗教,也传入了我国,如印度的佛教,波斯的祆教、摩尼教,欧洲的景教(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教派),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与这些宗教同时传入的,有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希腊、罗马等国的文化。这些宗教和有关文化的传入,对我国的哲学、天文、医药、音乐、文学等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方面的问题很复杂,这里我只想列举一些浅显有趣的事例。在长期历史中,从新疆或通过新疆有大量的农业植物传入了我国内地,如胡桃(核桃)、胡豆(蚕豆)、胡麻(脂麻)、胡瓜(黄瓜)、胡蒜(大蒜)、胡荽(芫荽)、苜蓿、葡萄、胡萝卜、菠菜(波斯菜)等等。另外,还有许多器物 and 食品传入,如胡床(马扎子)、乐器(四弦琵琶、胡琴、箜篌、唢呐等)、胡饼(烤饼)、波罗(抓饭)、印度的熬糖法、阿拉伯的烈性酒酿造法等。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也有与外国的交流。这两方面的交流,有些是很清楚的,有些究竟是在国内还是与外国的交流,颇难分辨。但是有一件事却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与国外经济文化

的交流上,往往是以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为中介的。譬如,佛教的传入内地,就是以古代新疆的僧人为中介的,有些佛经起初都是由焉耆龟兹文译为汉文的。在内地传教的高僧,有许多是古代新疆人。

近年来,学术界对我国文化史和地区文化的研究很活跃。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百越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先后有一批著作问世,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相比之下,西北地区文化史的研究就显得落后了,需要急起直追。在我们研究西北各民族的文化时,绝不能把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等同和混同起来。民族文化的内涵,大于宗教文化,宗教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不能无限夸大宗教文化的作用,不能把它说成是决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某种共同性的首要力量。

西北地区包括陕、甘、青、宁、新五省,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如何正确理解西北的涵义,乍看起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是存在着不同理解的,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先前有些人把西北地区统称为西北边疆,在西北地区虽有边疆地区,但西北地区的很大一部分不属于边疆,因此,不宜笼统地把西北地区称为西北边疆。有些人把甘肃地区称为边远地区或偏远地区,近日的广播、电视中也是这样说的。有的同志把甘肃的地理位置形容为“亦东、亦西、亦北”的地区,是颇有道理的。甘肃省省会兰州市,位于我国版图的东西之中,而且还稍稍偏东,怎么能说是偏远地区呢?也还有些人把西北地区与中原地区作为两种不同的地区看待,把西北地区看作了中原地区之外的地区。譬如,在近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是这样写的:“首先应突出西北与内地政权(统一或分裂)及汉族的关系。”又说:“中国地区民族关系之最主要者,应是这一地区的民族与内地汉族及其建立政权的关系。”这样的提法,就有些欠妥,而且也是自相矛盾的。首先,在甘肃南部和陕西省是周秦的发祥地。周武王灭殷后建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丰水东岸)。秦朝统一全国后建都的地方,也在西北地区之内,而不在西北地区之外。其次,秦朝统一全国后,

在今陕西省境内设置了内史、汉中、上郡,在甘肃省境内设置了陇西、北地郡,说明今陕西省及甘肃省的部分地区处于秦朝统治中枢的邻近地区,应该视为中原地区。再次,我国古籍中所说的中国、中原等名称,仅指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孕育和发展的地区。到了秦汉,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后,中国和中原的涵义就起了变化。由于秦朝和汉朝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等地,建立了许多郡,汉朝在今甘肃境内,除仍然保留秦朝设置的陇西郡和北地郡外,又增设了武都、金城、天水、安定、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版图扩大了,原来中国的涵义也就随之扩大了。汉朝所设的西域都护的辖境,虽属于中国版图,但与内地的郡县相比,也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其主要的差别在于西域都护的辖境内仍然保留着许多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国。至于中原一词,则有了狭义与广义的区别。狭义的中原仅指今河南省一带,至于广义的中原,有的认为仅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有的认为指整个黄河流域。大型辞书《辞海》与《辞源》对“中原”辞条的解释,就持这种看法。我个人是赞同这种观点的。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看法,应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改变,不宜泥古不化。秦朝统一中国后,中国一词的涵义就起了变化,而晋朝江统在其所著《徙戎论》中^①仍然把中原地区看作中国,而把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排除于中国之外,当然是很不妥当的。

愿《西北通史》在当前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中为人们提供历史借鉴,发挥其作用。

^① 《晋书·江统传》。

前言

清代（1644～1911年）是西北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清军入关后，在镇压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及王永强、米喇印、丁国栋等领导的反清斗争的同时，便在陕、甘驻军设防，逐步建立起稳固的统治秩序。接着，次第平定了王辅臣、噶尔丹、大小和卓、罗卜藏丹津等掀起的叛乱，统一了包括天山南北、青海蒙藏地区在内的广大西北地区，实现了自元末以来全国的又一次大统一，最终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本格局，也奠定了各族人民在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分布格局。

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为西北地区大兴屯垦，移民实边，兴修水利，振兴农牧业，发展手工业、商业、外贸以及城镇建设等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大大促进了各地之间、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西北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清代西北地区在儒学、文学、艺术、史学、教育、宗教等文化领域内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清朝政府日益腐败，国力衰竭，无力抵挡外敌入侵，中国社会一步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西北地区相继遭受到了沙俄、浩罕、英国的侵略，大片的领土被侵占，西北边疆陷入危机之中。面对危机，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主动寻求救危图存、变法自强之路，相继发起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以及“新政”，在局部范围、特定时段上，推进了中国

社会近代化的进程，从而也对西北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为了反对民族歧视和压迫，西北地区的回、撒拉、维吾尔等族人民不畏强暴，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在中国农民斗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推翻清朝封建帝制、争取共和制度的一场拼死搏斗。陕西、甘肃、新疆的仁人志士，在辛亥革命中都有不俗的表现，为西北历史增了光、添了彩。

西北历史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了解西北的历史，就无法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国历史的整体。对清代西北历史的认真研究、把握，必将会大大深化对清代中国历史整体的研究、把握，有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脉络，增强对西北地区大好河山、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的了解和关注，从而树立起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我国学术界历来比较重视对西北史地之学的研究。清代嘉道年间，西北地区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西北边疆史地之学应运而生、应时而兴，并逐渐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士林风气。由于它兴起于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加之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与传统史地研究不同，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18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期，我国研究西北史地的学者名家辈出，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形成了一个“梯队”，西北史地之学日益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清代西北历史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一、二册首开先河，将清代西北边疆史、民族史作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所论命题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马汝珩、马大正先生的《清代的边疆政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厄鲁特蒙古史论集》、《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杨建新先生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西北民族关系史》，杜荣坤、白翠琴

先生的《西蒙古史研究》，《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编写的《准噶尔史略》，郭绳武先生主编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写的《沙俄侵华史》（第三卷），王希隆先生的《中俄关系史略》，杨学琛先生的《清代民族史》，王戎笙先生的《清代的边疆开发》，马汝珩、成崇德先生的《清代边疆开发》，张羽新先生的《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袁森波先生的《康熙乾隆经营与开发北疆》，卢明辉先生的《清代蒙古史》、《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王希隆先生的《清代西北屯田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华立先生的《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林永匡、王熹先生的《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林思显先生的《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吴万善先生的《清代西北回民起义研究》，邱树森先生主编的《中国回族史》，苗普生先生的《伯克制度》，阿拉腾奥其尔先生的《清代伊犁将军论稿》，赵云田先生的《清代蒙古政教制度》，管守新先生的《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研究》等等著作，则从各自的论题出发，深刻揭示了清代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向世人展示了丰富多彩的西北历史画面。

国外一些学者在清代西北历史方面的研究，成就也非常耀眼，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如英国学者巴德利的《俄国·蒙古·中国》，原苏联学者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日本学者佐口透的《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等等。

特别是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新疆简史》（第一、二册），郭琦、史念海、张岂之先生主编的《陕西通史》（明清卷），陈育宁先生主编的《宁夏通史》，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先生主编的《青海通史》等通史类著作的相继出版，有力地深化了西北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大大便利了我们对《西北通史》清代卷的撰写。

《西北通史》清代卷，正是在广泛参酌上述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如果没有以上前辈及其著作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我们是

无能为力的。在此，我谨代表《西北通史》清代卷的编写者，向这些专家、学者由衷地致敬。

在《西北通史》清代卷的组织编写中，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吴廷桢、郭厚安（已去世）教授，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光华、王劲、王希隆、张克非教授，一直关心和指导着本书的写作，审阅书稿，我们同样感谢他们。

本书采取分工写作的方式完成，最后由尹伟先、马啸负责统稿。其分工如下：

第一章 执笔人：尹伟先 李建国 杨秀清

第二章、第四章 执笔人：尹伟先

第三章、第七章 执笔人：李清凌

第五章 执笔人：郑 峰

第六章 执笔人：马 啸 赵颂尧 张克非

在本书的定稿过程中，兰州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王永强先生反复校阅、修润文字，付出了不少辛劳。我指导的研究生刘洪、徐凌美、康建国、宋欣、孙建军在帮助核查史料、校对书稿方面，也付出了一定的辛劳。在此向他们一并致谢。

尽管我们主观上想把《西北通史》清代卷写得更好一些，并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做了许多尝试，但由于受学识水平的限制，本书难免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遗憾。我们诚挚地欢迎学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尹伟先

二〇〇五年中秋夜于西北民族大学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清朝统一西北地区	(1)
第一节 清军入关及其统一陕甘	(1)
一、清军入关与大顺政权的失败	(1)
二、清朝统一陕甘与西北地区的抗清斗争	(11)
三、“三藩之乱”期间王辅臣叛乱	(18)
第二节 清朝平定准噶尔 统一天山北路	(24)
一、准噶尔蒙古部的崛起	(24)
二、准噶尔汗国的建立和发展	(27)
三、清朝平定准噶尔 统一天山北路	(37)
第三节 清朝统一天山南路	(59)
一、天山南路的“回部”	(59)
二、准噶尔统治下的维吾尔地区	(61)
三、平定大、小和卓之乱	(64)
四、平定张格尔之乱	(73)
第四节 平定青海和硕特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	(75)
一、蒙古族进入青海	(75)
二、青海和硕特蒙古与清朝关系的曲折发展	(84)
三、和硕特汗廷的败亡	(89)
四、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	(92)